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解读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发布时间: 2009-02-08 点击次数: 933 作者: 高洪

【摘要】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经签署过《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三个政治文件。这三个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双方领导人亲笔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关键词】中日关系 政治文件 继往开来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在这次的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中,"[1]双方领导人亲笔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关系在时隔十年并跨越新旧两个世纪后,基于双方新的共同利益明确了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导新时期两国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为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一、第四个政治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经签署过三个政治文件。即1972年恢复邦交时发表的《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年两国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及1998年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2]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发挥了“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法律上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新世纪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的不同作用。尤其是1998年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明确提出“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的解释,这三个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因为,“中日关系的三个政治文件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也从长远和战略上,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3]

回顾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走过的历程,人们可以透过前三个政治文件中一脉相承的原则精神,清晰地看到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三个文件在35年时间里始终是中日关系克服矛盾和障碍,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框架和行为准则。毋庸讳言,由于时代发展与世界格局不断动荡变化,前述三个政治文件也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历史使命。进入21世纪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及大国关系的新调整给两国提出了新的议题。由于小泉执政时期执政上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外交上采取依傍美国单边主义的强硬路线,中日之间战略对抗成分凸显出来,两国关系也随之出现了大起大落,不仅严重危害到两国民众的切身利益,也给地区和世界造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为了解决上述困局,两国领导人在过去两年中,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的首脑外交往来,完成了中日之间从“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基础上的互惠关系”的酝酿提出到充实完善的过程,终于以缔结第四个政治文件的形式使之法律化,实现了两国关系新的界定,具有明显的里程碑意义。人们从胡锦涛主席以中国国家元首身份,在时隔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十年后首次访问日本这一基本事实中,也能够理解《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所具有的历史性作用。

二、第四份政治文件的实质在于继往开来

如果以一个“主题词”来表述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性质和作用,可以用“继往开来”这个词来概括它的精神实质。所谓“继往”,是对前三个文件的继承,体现了我们对日外交的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而“开来”就是说这个

文件不仅是对过去的继承,还有对未来的全面规划、创新、发展。

首先,“继往”意味着第四个政治文件对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并没有丢弃不管,文件中的第二点明确规定了“继承过去三个政治文件”,并由此推导出两国关系上要继续强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精神。**[4]**某些日本媒体说“中国政府不再提历史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恪守前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原则”,就是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既然此前已经把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讲得十分清楚,那么在面向未来的新的政治文件里,就不需要逐字逐句地重复前三个文件关于历史问题的描述。而且,既然在今天的中日关系上要面向未来,就应当认清过去不幸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在防止不幸的历史重演,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也要“淡出历史悲情”,通过双方努力为后人留下中日两国关系在**21**世纪初期相互信任、共同发展的美好历史。

其次,在开创未来的意义上讲,规划两国关系发展的新局面、新高度是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本质。胡主席这次在访问之前接受日本**16**家媒体联合采访的提问时,曾明确表示访问的目的在于“增加互信、加强友谊、深化合作、规划未来”。在《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5]**这一表述既是双方对时代变化与历史责任的共同判断,也是当前各自发展中重大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近邻,两国的经贸合作各有优势,应该优势互补,而且合作的潜力很大。中日两国**GDP**相加约占东亚**GDP**的**80%**;人口相加约占东亚人口的**70%**;进出口贸易额约占东亚贸易额的**60%**。毫无疑问,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国家,持续改善并发展双边关系,必将对东亚以及世界局势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两国通过双边渠道促进东亚地区各个领域的合作进程,对于构建东亚地区的和谐秩序十分有利,对于世界经济的走向也将产生推动性的影响。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一面在通过积极筹办奥运会向世界敞开胸怀,同时也在积极迎接共和国**60**年大庆的到来,营造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周边环境尤为重要。

而对于日本来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如何避免成为日美欧三角中脆弱的“泄洪口”,防止“泡沫经济崩溃”与“亚洲金融风暴”重演是至关重要的紧迫任务。经验告诉日本,在世界经济形势动荡不安且充满风险的局面下,东亚是一个避风良港,其中最具有发展潜力与抗风险能力的强大中国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对此,福田的外交智囊们十分清楚,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就曾经明确表示:“中国正在摆脱百年低迷期,不用很久就能夺回东亚国际关系的中枢地位,日中关系的和平发展对日本极具战略意义。”**2008**年春季以来,日本景气动向的**10**个指标下滑,景气先行指数甚至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首次触及零水平,日本媒体惊呼:如果政府和央行不及时采取行动,那么日本有可能不再是“一等经济”了!

伴随中日签署“第四个政治文件”,两国共同发表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里,关于今后交流合作项目、计划、领域已经多达**70**个。那么,中日之间的互惠合作是否已经“饱和”?答案显然是否定。在新的形势下中日两国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新的合作机遇。双方应本着战略互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创新合作方式,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障碍,扩大共同的利益,积极推动两国在贸易、投资、能源、环保、信息、通讯、物流、金融和高科技等更加宽广的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务实合作,两国企业还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携手开发在第三国(国际市场)上的合作,共同谱写中日睦邻友好、互利互惠和和谐共赢的中日经贸合作的新篇章。

三、坚持政治互信、恪守文件精神是关键

事实上,中日两国无论在谋求共识的精神层面,还是在寻求合作的现实层面,都有继续拓宽发展的空间。然而,既使是在战略互惠关系框架下中日两国仍不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不管是看世界形势变化,还是中日关系充满反复和波折的历史,都告诉人们,作为毗邻在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也必然面对着国家战略利益的对峙与分歧,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纠葛在一起,更是难于—蹴而就地解决。就目前情况来说比如日本政治局势不够稳定,日本保守党内部也有一些和福田首相努力推进与中国关系友好交往不尽一致的声音。惟其如此,抛弃冷战思维与旧的零和博弈观念,树立真诚的政治互信,立足大局和放眼长远就显得十分必要。

胡锦涛主席曾强调指出:“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义。中日双方要共同努力,不失时机地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更高发展阶段。”**[6]**事实上,中日两国无论在谋求共识的精神层面,还是在寻求合作的现实层面,都有继续拓宽发展的空间。我们期待两国签署了第四个政治文件后彻底、完整地遵守文件,尤其希望日本不要因为政治动荡、政局变化影响到对第四个政治文件的政治承诺,不要在中日交往中让小的摩擦引发大的危机,从而妨碍了双方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政治互信的核心是“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原则上隔年互访,在多方场合频繁举行会晤。加强政府、议会、政党间的交流和战略对话机制,就双边关系和各自内外政策及国际形势加强沟通,努力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高层互访,促进多层次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从理论上讲,增加政治互信主要指领导人与政府层面的相互信任关系。[7]但民间在草根层面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则更为重要。用政治文件的表述就是“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双方确认,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利于巩固中日世代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为此,广泛开展两国媒体、友城、体育、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及知识界交流。持之以恒地开展青少年交流。”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两个大国家、两个大民族之间最终的和解一定需要民众层面上的和解,今天的大国外交无不是“以民为本”的,政治家的决断和选择也离不开老百姓的基本意见和总体要求,在“官民”的外交平衡方面,如果只有一个官的轮子走得很快,民的轮子走得很慢,结果必然会使两国关系走偏,所以通过草根的交流,使两国民众真正能对对方有所宽容和理解,而中日文化交流更是今后应大力加强和推进的一个重要领域。

实事求是地说,中日民众在心理上的隔阂根源于日本对历史认识问题反省的不够彻底,而弥补这种不足的根本方法仍在于日本在对华问题上要“多行善事”。按照早稻田大学国际地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迪教授的观察,“尽管在制度上日本政治引进了很多欧美政治的框架,但日本政治的过程仍然存在大量的东亚传统政治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中国和日本其实都远没有西化”。所以,寻求东亚共同的价值观,在文化意义上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同样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清人魏禧在《日录里言》论述人际关系时说:“夫交友者,识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其实,放大到国家、民族也是同样道理。中日在相互了解中,寻求战略定位的一致性,克服相互猜忌、怀疑的偏见,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真正建立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以金融合作为例,近几年中日韩三国达成的协议与亚洲开发银行所提出的“亚洲货币单位”不谋而合。主导亚洲经济的中日韩三国着手探讨区域货币单位的可行性,为将来实行统一货币等金融合作迈出前进的一步。尽管亚洲金融合作还刚刚起步,没有完全可依照的范本借鉴,中日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观点,“亚元”要变成一种真正的国际货币,在全球任何地方兑换和流通,就必须增加中国和日本经济体系的融合度。近来,美元持续贬值,国际原油、粮食、有色金属期货一涨再涨,美国正在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让全世界为美国买单。如果和欧洲一样,亚洲以中日为中心,俄国、印度参与进来,四国央行共同组成亚洲中央银行,发行亚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三极,来共同面对美元的掠夺,那世界金融体系将是一种新的局面。从国际经济发展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未来趋势。而从地缘政治,资源互补性,从亚洲各国的长远利益看,成立亚洲央行,发行亚元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考虑。

记得亨廷顿曾预言:“东亚未来的和平与幸福,取决于中国与日本的共生,并找到携手共进的道路上。”不管亨氏其他理论如何,作为研究国际战略关系大家,这一论述可谓不无道理。中日两国首脑将通过会谈共同谋划未来两国关系美好前景,而东亚两个巨人的握手将对地区乃至世界产生深沉久远的影响。最近,有人著文批评日本仍摇摆在“回归东亚还是选择加强与美国结盟”的问题,[8]指出日本首相福田首相的“太平洋内海说”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与安倍晋三前首相的“大亚洲构想”下的“价值观外交”相比较,福田在2008年5月22日在东京举行的“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发表的《当太平洋成为‘内海’之日》[9]中阐述的亚洲外交的基本方针还是有其值得肯定的成分的。福田所言“内海”,并非美国倡导的APEC的“二次包装”,也显示出更为重视中国和亚洲的倾向。”就此而言,可以将福田的新外交政策看作是与其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相得益彰的努力。中日政治经济合作的大前提是平等、互利、双赢,中国与日本认清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互惠合作关系”,并将其作为今后国家关系发展的基本准则,这是两国关系成熟发展的标志。

注释:

[1]2006年10月到2008年5月,在不到两年中中日领导人四次互访。胡主席访问期间签署的中日关系第四个政治文件,为这一时期“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的首脑外交划上了历史性的句号,访问也因此成为“历史性的访问”,其政治意义超出了此前的“重要访问”。

[2]按照通行的国际法理论,两国之间缔结的双边条约(主要指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或具有条约性质的声明、公报,因其具有约束缔约双方遵守承诺与行为规则,并在内容分类上表现为政治、法律类别则属于“政治文件”。各种不同名称的双边国际协议只要在实质上符合上述定义,对当事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它们都是国家间的“政治文件”。至于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条约、声明、宣言的含义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则需要根据其特定

背景和含义予以认识。

[3]见《人民日报》2007年03月16日,第1版。

[4]《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第三条为“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5]引自《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第一条,第一款。

[6]引自胡主席2008年5月在早稻田大学演讲,见新华社2008年5月8日电讯稿。

[7]中日双方决定在以下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一)增进政治互信。(二)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三)加强互利合作。(四)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五)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双方共同面对挑战,将从战略高度开展有效合作,共同为推动解决上述问题作出应有贡献。

[8]刘新宇:《日本:是回归东亚还是继续骑墙》,引自2008年7月14日。

[9]福田在这一演讲中呼吁环太平洋各国加强经济合作,将太平洋变成像地中海一样能够频繁进行人员及物资往来的“内海”。

[10]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福田的内海“连接了日本、中国、俄罗斯、美洲大陆、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直到中东。”而《读卖新闻》2008年5月23日则分析说,“新福田主义”包含了与亚洲国家加强关系的具体措施和强烈愿望。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秘书长。

转引自《日本研究》2008年第2期 编辑：丁维伟